

收稿日期:2023-12-20

中国现代文学教育救国叙事的 谱系追踪与价值探究

刘秀珍

(盐城师范学院 文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2)

摘要:教育救国叙事是现代文学创作的独特一面。现代文学作家糅合多元教育体验与自觉启蒙意识,造就了纷繁多样的教育救国叙事。现代文学教育救国叙事融文学和救国教育于一体,构成了多重主题的现代文学类型,而教育救国文学也开辟了文学写作的新路径,呈现出丰富多样的文学内涵及创作风格。现代文学所展示的教育救国探索史,为现代教育改革提供了意义深刻的思想与价值重要的史料。

关键词:教育救国;中国现代文学;叙事;话语;谱系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24)02-0099-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华文文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22&ZD280)。

作者简介:刘秀珍(1979—),女,安徽固镇人,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及华文文学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4.02.025

回望中国现代文学的百年发展史,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贯穿始终。文学是人学,教育同样以人为中心对象。因此,“教育救国”一直或以隐或显、或正或反的叙事方式成为现代文学创作的独特内容。教育救国叙事凝练了特殊视域下中国知识分子现代主体建构的历史进程,是其精神史与心灵史的重要构成,也是现代文学研究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已有研究或以切片视角,将其纳入“教育小说”“文学教育”等研究范畴;或基于创作个性研究,将其视为现代知识分子主体经验生成史的重要构成^[1-3];或将其作为新式教育研究的素材^[4];或将其作为教育救国历史研究的素材。而真正全面探讨现代文学与教育救国谱系关系及其价值的研究则不多。加大对现代文学教育救国思想渊源、转型与走向等的研究,既有助于深入了解其产生的文化语境,也有助于跳出文本内部研究框限,以跨学科视野重新审视教育救国文本的多重意义与时代价值。

一、现代文学教育救国思想溯源

近现代以来,中国在摸索中开始现代化的艰难转型。教育救国思想正是在道路探索中形成的重要社会思想之一,它始于洋务运动晚期,经维新运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在1930年代前后乡村建设运动时期进入高峰,回落和转型于抗战爆发后,经历了萌发与形成、勃兴与高涨、回落

与转型的历史演变过程,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也在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教育救国思想的生成与演变

著名教育家舒新城认为,教育思想的产生主要源于四种“支配势力”,依其重要性分别为政治思想、社会思想、世界思潮、学术思想^[5]。教育救国思想的提出,与近代以来中国探索富强之路息息相关。民族矛盾和社会危机刺激下的民族觉醒、西方教育强国的经验,以及国人对救国方案的探索和反省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结合,共同促成了教育救国思潮的形成和发展。

论及近代中国教育救国思想的萌芽,可谓实逼处此。如果把林则徐、魏源、徐继畲等人提出“睁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视为教育救国思想的萌芽,那么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早期洋务派基于物质层面提出“技术教育救国”改革主张和实践,则是教育救国思想的兴起。张之洞等人“中体西用”思想体系的建立,则表明后期洋务派改革思想由“器物层面”到文化制度层面。“中体西用”的价值体系地位,发挥了一定程度的“会通中西、权衡新旧”的历史作用,为教育救国思潮的勃兴提供了思想与实践基础。甲午海战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与“中体西用”论的过时,此后迎来了教育救国思潮的蓬勃发展与高潮时段。“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6]由此,教育救国论由注重学习技术、制度文化转向改造国民精神和道德,并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推向更为具体而微的层面。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致力政治文化革新,倡导发挥教育改革功效,重塑国民精神道德,提出了“国语”“国教”“国俗”合一的“国性”及“新民”论。“今天下治之不举,由教学之不修也。”^[7]同时,思想家严复孜孜翻译《天演论》《群己权界论》《原富》等西方经典,亦在“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由学习日本维新经验转向借鉴欧美教育文化资源。新文化运动前后,胡适、陈独秀、李大钊、张伯苓、蔡元培、鲁迅等纷纷参与文化教育,或以个性解放与国民改造为切入点,号召“学术救国”与“教育先行”,或批判教育乱象为教育救国论诊脉探路,对新式教育寄寓厚望。如鲁迅《摩罗诗力说》和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皆竭力宣扬新文学教育对改造国民性和革新社会的重要意义。这一时期,教育救国思想得到广泛传播,而教育救国论之弊也渐至累积。适应抗战爆发和历史新使命要求,“九一八”事件成为触发教育救国思潮转向的直接动力,教育救国思潮开始走向回落与转型。

教育救国思想既借鉴了日本维新运动与西方教育的经验,也鲜明继承了中国传统教育“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儒家思想。表现于教育目标层面,由初期的学习技术、培养人才到人格塑造、道德意识及民族精神养成;表现于实践层面,由初期重视专门教育、科学教育、人才教育,到反思整个传统教育制度而废科举、兴学校并推行民众教育,提出公民教育及政法教育,再到黄炎培等大力倡导的职业教育及义务教育、留法学生发起的平民教育,以及1930年代乡村建设推举的民众教育等^[8],本土化教育思想由此得以深入发展。

(二)“教育能否救国”——教育救国论的批判与反思

东三省沦陷后举国愤激,学生罢课救国却被当局奉劝“好好读书”。“教育救国是对的……可是中国没有救国的教育。”^[9]这既表明了1930年代教育救国思潮饱受质疑与教育反思形成的历史语境,也折射了当时社会的相关舆论走向,即如何以务实精神推进教育救国实践。

早在1920年代,敏锐者就已发现教育救国实践弊处所在,并犀利批判教育界争权夺利、相互倾轧、各为党派之乱象,“教育不能自救,何以救国”^[10]。1930年代,一度被期待过高的教育救国论遭受规模化批判,引起人们深刻反思。各界纷纷质疑教育救国失败之表现:一是针对国民“贫、

弱、私、愚、乱”开出的教育药方,如“职业教育”“生产教育”“科学教育”“公民教育”“健康教育”等,不但未产生预想效力,反而沾染了“教育病”“文明病”,造成负面效应;二是缺乏实事求是精神,盲目生搬西方教育模式。“‘教育救国’!这是十余年前时髦的口号。‘教育破产’!这是近年来国内普遍的呼声。”^[11]陶行知总结为:先生“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学生“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12]。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教育救国反思,是民国时期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刊物《教育杂志》发起的“全国专家对于教育救国的信念”专栏讨论^[13],它以将近整版篇幅择录了三十多位学者的论述。讨论认为:教育救国立论正确,但教育功能不可简单化、片面化;教育要发挥救国效能,必须与政治社会改革相结合。如吴稚晖所言,以武装抵抗救国如同生病“吃药”,但要真正恢复精神或显出精神,还必须吃饭即教育救国^[14]。讨论还反思了新式教育盲目西化、脱离国情的弊端,倡导加强民族主义的“救国教育”,推行符合国情需求的乡土教材,研究符合中国儿童心理特征的教学方法,培养对应社会需要的实践型专门人才等。这一讨论和反思的意义在于:一是全面总结与反思了教育救国历史实践的得失,对形式欧化、内里科举思想的“新教育”进行了辩证批判;二是开始向中国传统教育思想探寻,提出以实事求是精神发挥教育的救国功效;三是逐步摆脱承载过重的单一效能期待,回归教育合理定位。现代教育开始由泛化的“教育救国”理想走向积极务实的“救国教育”实践,以卓有成效的抗战教育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开创了教育救国的新阶段。

(三)教育救国思想对现代文学的多元影响

教育救国思想落实到现代文学创作中,是散文、小说、戏剧等文体形式的教育救国叙事。现代文学经典作家多兼有作家与教员双重身份,他们或转徙各大学任教(如鲁迅、巴金、胡适、茅盾),或出身中小学教育界,熟悉生态变迁与人事风景(如叶圣陶、老舍、夏丏尊),他们的创作因糅合丰富教育体验与启蒙救亡意识,成就了现代文学的纷繁教育救国想象与叙事景观。

首先,教育救国思潮、实践及其变迁史为现代文学创作提供了鲜活素材与新主题。梁启超作为教育救国小说的先驱者,大力提倡小说“熏”“浸”“刺”“提”的群治与新民功能,在政治幻想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令“孔曲阜先生”演讲宪政党治国成功经验,特别强调教育救国之贡献,声称“教育为本党第一大事”^[15],是近代以来最早将文学叙事与教育救国思想结合的小说实践。“教育救国”是新文学运动高度重视的杂文议题。陈独秀主张新教育目标与现实紧密结合,应了解“人生之真相”“国家之意义”“个人与社会经济之关系”“未来责任之艰巨”^[16]。蔡元培、胡适等提出“学术救国”“读书救国”论,倡导“真正救国的预备在于把自己造成一个有用的人才”^[17]。林语堂则批判教育救国为“谬论一束”^[18]。鲁迅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多涉教育界人事的深刻剖析与批判,建构了“教育救国”反向叙事。其中,既有孔乙己、陈士光等深受科举教育毒害的旧知识分子,也有在五四运动落潮后陷入痛苦迷茫的魏连受、吕纬甫等现代知识分子。这种力陈教育之弊的忧患意识,正是鲁迅基于教育者身份与启蒙使命的自觉性表现。茅盾小说从静女士信仰的“静心读书”开始,延续至后来的梅行素、张曼青等对教育事业的追求,无不贯穿了内涵丰富的教育救国叙事。最能反映现代教育救国思潮及历史表现的是叶圣陶、老舍的创作,前者以长篇小说《倪焕之》及多部短篇小说创作,提供了中国现代教育的史料价值。“从他的创作中,不仅可以看到中国教育界的现状,以及矛盾和症结,还可以看到原理方式上的争论、新旧思路的冲突、校内外生活情形、师生间的关系和各自的矛盾,以及经济的状态等。”^[19]老舍则通过各类题材创作,揭露教育界黑暗状况并予以剖析。从茅盾、巴金、张天翼、王西彦、路翎、沙汀、杜衡等作家的作品中,亦可梳理出教育救国理想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表现及变化,呈现了教育救国思想从高涨到转型的流变景观。这些林林总总的教育救国叙事,是现代文学丰富景观的重要组成。其次,教

育救国思潮不仅影响了现代文学的主题与题材选择,也呈现了教育史视野下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史与成长史。《倪焕之》《蚀》《虹》等既表现了倪焕之、张曼青、梅行素等知识分子追求教育理想过程中的兴奋、茫然与痛苦,也描写了大革命前后知识分子群体探索人生、追求真理的精神史,他们由被启蒙者到启蒙者再到改革者甚至革命者的成长史,再现了知识分子主体确立社会现实与自我归属关系的认同与重建历程。

二、现代文学中的教育救国叙事

(一)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教育救国叙事

教育救国叙事属于教育叙事之一,其核心是“救国”效能的路径探索与价值判断。与通常意义上的文学教育相比,它具有清晰的时代内涵,蕴含了强烈的现实功利性指向。遵循这一功能标准,无论批判或褒扬,都蕴藉了创作主体对教育功能、教育者的理想期待或现实思考。教育救国叙事产生于特殊的历史时代与文化语境,它与现代中国的救亡、启蒙、抗战等时代议题紧密结合,拥有超越教育救国字面范畴的广泛实现路径与话语表述可能。也就是说,围绕“救国”目标而呈现的教师形象剖析与教育改革实践,所描述的教育与社会、教育与个人之关系等为教育救国叙事一种。基于此,“教育救国”获得了方法论意义,可以运用“教育史+社会史+文学史+生活史+心灵史”等多维度组合的研究方法,重新审视教育救国叙事的来龙去脉、历史意义及当下价值。

叶圣陶的教育小说系列和其他教育救国叙事作品一起,展现了旧中国教育艰难转型的探索图景。作为1920年代小说的“扛鼎之作”(茅盾语)和现代文学经典文本,《倪焕之》以热心教育改革的年轻人倪焕之为线索,串起了小城镇——乡村——都市的教育改革探索之路。倪焕之三次“出走”,源于其从“如何教育学生”到“如何教育社会”教育理念与教育目标的转变,从问题表层逐渐触及社会改革的根本。受五四新文化思想启蒙,倪焕之怀抱教育救国、改造社会的理想来到乡村,与校长蒋冰如和妻子金佩璋编教材,开办农场、商店,创设舞台等,力图实践教育家杜威提倡的“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活”的实用主义教育理念。这一改革过程始终存在着教育的革新与守旧、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既有改良派的蒋冰如与探索者倪焕之的对比,也有革新派与守旧派的激烈博弈。汪文宣、曾树生和张曼青虽因冷酷现实而铩羽,但他们的教育探索仍有其积极意义。蒋冰如与倪焕之对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贯彻,关于儿童“心”与“性”的讨论,以及倪焕之的乡村师范改革新计划,张曼青的课堂教学实验,洪翰真在难童学校开展的“教养合一”“新教育改造试验”,汪文宣与曾树生“做理想工作”“办教育”的新教育愿景,皆蕴含了旧中国现代教育改革的历史探索轨迹,有着鲜明的教育史及社会史意义。

与此同时,教育救国理想推动着教育者的人生变迁,铺叙了他们不断“出走”的生活史与精神成长史,建构了独特的流徙风景叙事。出走或离去,都象征着新文化语境与人物命运可能性的展开,在风景镜头的转换与对教育事业的不断叙说中,烙下了鲜明的时代印记。倪焕之在三次人生迁徙(小城镇——乡村——上海)中,既看到水乡小镇的宁静与朴素人事表面下的愚昧落后,也见识了都市繁华背后的丑恶黑暗,领略到热血沸腾的革命力量,从而获得新的精神启蒙。另一个理想主义者蒋冰如却在阻力面前止步,退却为旧式乡绅。兼有新女性意识与传统性格的金佩璋,遭遇变故后从少奶奶式生活中觉醒,迈向坚定的独立女性之路。尤楚离开让他“倒大霉”的城市到了乡村,看到天空与地面的辽阔,感受到校长的热情、村民的友善、乡村的美好,这些激发了他传授知识的理想。“努力心灵的开垦,在荒原上点亮一盏小灯”“社会还需要聪明的人前去改革,他自己却又恰恰负着教人向上的责任。”^[20]但乡村很快向这位年轻人展示了残酷的真相:他所尊敬的校长是地方的“虎”与爪牙,惯于欺压教员与百姓;表面祥和的乡村风景下,是村民们悲惨穷困

的生活……尤楚的以教育改良社会的理想终归破灭,其知识分子的正直、善良、天真与自由精神,与时代赋予的悲剧命运互为映衬,隐喻了单纯以教育改造乱世的“行不通”。此外,洪翰真不做耽于享乐的富家女,跳出深宅大院投身救国教育;流浪多年的师范生萧涧秋(柔石《二月》)是偏僻芙蓉镇的“外乡人”;而一心一意要教育救国的教师白知时(李劫人《天魔舞》),在大后方成都唯利是图的环境中,竟变成了投机倒把、利欲熏心的商人……这些人物漂泊、迁徙途中体验的新风俗与文化景观,并由此发生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与人生轨迹变化,都以丰富的叙事,为考察当时社会不同区域的政治、经济及文化心理,探讨现代知识分子与时代、教育的关系提供了生动样本。“现代小说中的‘教育救国’理想也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镜像’,小说创作由此完成知识分子对自我价值、自我心灵以及精神成长历史的言说。”^[21]教育职业体验与跌宕的人生风景交织为丰富多样的教育救国叙事,成就了独特的文学景观。

(二)教育救国叙事呈现的多维景观

教育救国叙事投射的多是教育主体的失落、惶惑与痛苦,是美好教育改革理想与冷酷现实碰撞失败后的愤懑、消沉与反思。这些反映了教育界积弊丛生的历史重负,凸显了社会变革的负面效应,也描写了知识分子在现代性影响下建构自我与世界关系,在自救、救人之间获得精神成长或被现实异化的历史景观。

对传统教育或者所谓“新教育”的批判,构成了教育救国主流叙事的反向言说。以人物形象为例,有鲁迅笔下保守派教师方玄绰、不学无术者高尔础、教育理想破灭的魏连受,以及沦落为保守派靠教“子曰诗云”混日子的吕纬甫;有叶圣陶塑造的志未酬身先死的倪焕之、面对一群混迹学校不务正业的教员却应对无力的校长叔雅、卑琐自私的“灰色”形象潘先生;有沙汀描绘的“困兽”知识分子群体;等等。与此同时,几乎所有怀抱教育救国理想的改革者都是“孤独英雄”,或死去,或沉沦,或堕落,或离去。他们的遭遇同时也暴露了教育界的多面性。兢兢业业专心于教育事业的徐子修(杜衡《漩涡里外》),却因学潮和学生一同被诬陷,揭露了教员们的勾心斗角与当局的反动无耻;贪婪敷衍的教育局长(叶圣陶《城中》)完全不顾被欠薪教员的死活,开除组织讨薪的郭先生,教育“光明前景”的理想顿变“虚幻的火焰”。批判最犀利、反省最深刻的莫过于老舍的系列作品。首先,作为教育者,老舍洞察当时教育制度弊端所在,他深刻剖析了教育救国的失败根源。主张“钱本位”的老张(《老张的哲学》)创办学堂,不过是为挣钱,罔顾学生受到何种教育。《月牙儿》的“我”悲叹“学校里教给我的本事与道德都是笑话,都是吃饱了没事时的玩艺”^[22]。《牛天赐》《包氏父子》等均包含了对不合理教育制度、教育形式及教育内容的揭露与反思。其中,《猫城记》最具象征意味。这部小说借猫人之口,自上而下对教育制度和教育者进行了全面反思与激烈批判。猫国对外国教育制度“低能抄袭”,封建科举思想的遗毒,腐败统治下教育经费匮乏,于是新教育、新学校成为新的饭铺,最终导致“教育是没用的东西,而教员是无可敬畏的玩艺”^[23]。其次,在批判之外,如何建设新教育,如何教育救国?老舍借《赵子曰》中的李景纯给了学生三点救国建议:学好一门课;学习农学并实践;办实事。对教育者来说,首要“有点理想”,有“知识与人格”。这与教育救国思想提倡的“道德”“精神”及国民性教育形成契合,不自觉接续了梁启超的人格教育理念,表明老舍对教育救国思想并非全盘否定,而是结合时代需求予以新阐释和批判性继承。

当然,失望、批判、暴露并非教育救国叙事主题的全部。伴随时代巨轮的前行,新事物、新变化也赋予了教育救世理想者隐约可见的希望。《倪焕之》中,结尾的梦境暗示与金佩璋的觉醒,梅女士在幻灭、动摇之后走向革命洪流;《二月》中,陶岚兄妹奔向上海与萧涧秋会合;章桐(《困兽记》)离开令人窒闷的小镇,奔向延安……这些未竟待续的叙述,不能简单被视为“光明的尾巴”,

而是昭示着教育救国叙事即将到来的转型。在全民抗战的呐喊与硝烟之中,曾负载过于沉重的教育救国实践开始发挥现实功能。抗战运动背景下的教育救国叙事透露出了新主题与新风格。乐观的洪翰真带着天真活泼的难童拥进古屋,使阴森的家族城堡漏进了一线春天的阳光,象征旧事物“迟早要经受新的社会文化精神的冲击和改造”^[24],呈现了教育救国叙事中难得的亮色。罗洪《覃老伯》^[25]写受过大学教育的覃宗尹回乡办教育,团结乡绅胡乃良向乡民进行抗战爱国宣传,成功唤醒了乡民的反抗精神与民族意识,显示了迥异于以往的教育救国叙事风格。

教育救国叙事的崭新形态,在根据地文学中最为突出。与以往教育形态不同,“战时教育”为了直接有力地配合抗战救国,将培育民族精神、宣传抗战、培育革命新人作为教育首要目标。教育不限于围墙内的学校教育,还包括面向广大普通民众的社会教育,二者互融互动的教育使命在于:

为武装数百万有高度民族意识的民众,不能不把无数浑浑噩噩的“聋子”与“瞎子”都振发起来,这里需要全面的发展国民大众教育及教化,从顽固的偏见,龌龊的习惯,从愚昧,无知,迷信,盲从的旧的精神生活解放出来,放在抗日的民族战线上,放在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的建设上,改造他们自己。中国民族将在解放战争过程中,改造自己的本性。^[26]

因此,叙说根据地文化思想教育的成效、发现与揭示问题、塑造新人形象构成了此类作品的主题。师田手小说《荒山的女儿》生动描绘了大城市来的穿丝缎旗袍、高跟鞋的摩登女郎马兰,在延安的社会教育锻炼下,实现了脱胎换骨转变的故事。开荒种地,除草浇水,做饭揉面,赶着毛驴驮水……马兰对自我新形象的满意和自豪,意味其从身体到精神彻底完成了知识分子转变。“她知道唯有把自己完全投身在革命之中,才有真正的个人生命存在。”^[27]孔厥《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以人物通讯的形式,详细叙述了延安一个旧社会童养媳出身的农村妇女折聚英,如何百折不挠参加社会教育学习文化知识,最终成长为优秀女干部的故事。从“只值两斗谷子的女人”到抗日战士、学习模范,再到全边区百万妇女的代表之一——边区参议员,被誉为“女英雄”的折聚英这一新人形象正是根据地教育的突出成就。与上述类似,根据地文学倾向展示抗大、鲁艺、冬学等多样教育形式的积极效应,如脱盲、打破陈规陋习、树立平等婚姻观念、建构民俗新风尚等。如师田手《硬席车上》、潘之汀《满子夫妇》、康濯《我的两家房东》宣传识字教育与妇女教育成绩;宋晓村《一个私塾先生》写一个封建思想严重的私塾先生在根据地教师研究班受教育后转变为新教师,这些皆呈现了根据地视角下教育救国的新叙事。

“救人”与“自救”,是教育救国叙事反复言说的重要主题。教育救国,是要培养理想的人,要破除旧式不合理教育对人的摧残。《包氏父子》中小包纨绔恶劣人格的养成,既与老包封建科举思想遗毒有关,也与所谓的新式学校忽视学生教育、只顾巧立名目牟利分不开。《牛天赐》主人公虚伪、折中、调和、平庸、敷衍的人格特征,是失败学校教育与迂腐家庭教育结合的典型表现。这些消极的“教育产品”,是抨击教育弊端的鲜活例证,也促使教育者探究如何培养社会需要的“新人”。如倪焕之实验新的教育理念与方法,以开设农场、演剧、做手工等多种方式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张曼青认定“青年终必要走上他们自己的历史的路”,投身教学改革,引导学生关心时政,希望培养一代新人;《困兽记》中的田畴、牛祚等一帮教师,具有教育救国的热情,联合返乡的革命者章桐,筹划在小镇演出一场抗战爱国剧,企望改变小镇令人窒息的氛围;萧涧秋救助寡妇母子,期望改变世俗偏见。“救人”效果虽或失败或茫然未知,但主人公抱持的救世理想,闪耀着冲破世俗束缚的改革精神与勇于奉献自我的人道主义精神光芒,他们点燃的星星之火奠定了现代教育改革的历史基础。也因此,作为教育者的知识分子,在面对救国理想挫折之时,善于反思与救赎十分重要。《古屋》中的廖慧君是位虽受过现代教育却裹足不前的知识女性,在“我”与洪翰真影响

之下,终于勇敢逃出黑暗阴沉的旧家庭寻求新生活;倪焕之融入群众革命洪流,由闭门改革转向“有组织”的社会活动。当计划失败,缺乏自救能力的田畴感到空虚幻灭,敷衍对待人生。而具有“老牛筋”坚忍精神的坚守者牛祚和果敢出走的行动者章桐等蕴含积极力量的人物则“向读者指明一条道路”^[28],显示出对教育本体力量的期许。

救教育、救人或自救,无不熔铸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民族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分子重新发现自我,透过教育救国事业的参与和反思照见自我的社会位置与文化身份,他们的创作实践同时获得了多重主体性意义,这也是教育救国叙事衍生的独特价值。

三、现代文学与教育救国互动的影响与价值

(一)现代文学的独特风景建构

首先,教育救国叙事融文学和救国教育于一体,构成了多重主题的现代文学类型,开辟了“为人生”文学的新局面。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文学是人学”与文学是“为人生”的观念深入人心。先锋知识分子自觉担当启蒙使命,以现实主义创作关注现实、关怀人生,促发了“问题小说”创作潮。和传统文学相比,新文学面临改造旧传统、建构新传统的双重任务。教育救国文学以教育救国实践为题材,一方面真切表现百年中国动荡历史中的“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命运变迁;另一方面以“人”为中介,表现不同历史时期教育被赋予的特定内涵、历史使命及实践记录。本质而言,为人生的文学与教育事业的终极目标一致指向启蒙与救亡,推动教育发展也是现代知识分子致力目标之一。因此,教育小说能成为现代文学的重要“品种”,教育救国创作则是教育小说最具张力的部分。就主题而言,“教育救国想象”作为糅合“教育”“启蒙”“救亡”“成长”等多重主题的现代文学类型之一,借由书中人物所经历的各种教育事件,去多方开展文学想象。它对大变局时代中国的百科全书式描摹,既汇聚了时代对教育救国的热切期望,也记录了对教育救国的怀疑、失望、批判、困惑。这种“爱恨交织”的矛盾心态,既彰显了文本内在的情感张力,也是现代中国民众成长心路的缩影。

其次,教育救国文学开辟了文学写作的新路径,并呈现出丰富多样的内涵及创作风格。教育救国叙事深化了现实主义创作,以壮阔的社会背景与动态的历史描摹提供了观察现代中国转型与发展的复合视角。纵观现代文学的教育救国书写,乡村与都市之间的流徙变迁,教育生态的鲜明对比与风景体验的迥异,给本就充满流动性与漂泊感的教育者主体带来了巨大冲击。这些新鲜的异地图景与另类体验,都磨砺了创作主体书写历史的现实主义技巧。《倪焕之》是教育救国文学的重要代表作,表现了大革命后知识分子的历史处境与精神状态。相较于当时大量标语式宣传教育救国的作品,夏丏尊称赞其突破了“千篇一律式的、或者纯宣传品式的革命论”,在文坛是“划一时代的东西”^[29],认为简单将它归入“教育小说”未免忽视了其他方面的价值,他指出小说对乡间民俗与重大事件描写同样用力。这一评价颇有见地指出了小说现实主义的表现张力,也为后来研究者从风景体验、空间转换等角度探索其美学价值提供了思路与线索。小说既“反映了新教育兴起、现代知识空间扩展、城乡社会分离等多个进程之间的联系”^[30],也提供了“剧变时代的‘新村’想象”^[31],在艺术形式、语言及形象塑造方面也集中显现了现代白话小说艺术的早期探索。《虹》是茅盾“欲为中国近十年之壮剧,留一印痕”^[32]创作现实主义巨著的尝试。女主人公梅行素个性桀骜不驯,力图从形形色色的旧势力压迫中“突围”,经历了受教育者到教育者身份的转变,冷酷现实使她认清所谓“新式教育”不过是“旧材料披上了新衣服”。伴随教育理想的破灭与不断的人生“再出发”,一个执着于探索出路的时代女性形象跃然纸上。可以说,正是教育救国思想影响为塑造这一新女性形象提供了有意义的生成场域,拓宽了现代文学的表现路径。此外,

如《财主家的儿女们》《困兽记》《漩涡里外》等,均在或隐或显的教育救国主题呈现中深化了现代文学表现力与审美视域,共同推动了一片独特文学风景的形成。

(二)现代中国教育救国史变迁轨迹的特殊记载

教育救国理想以文学为媒介,或构造教育的乌托邦,以寄托作者欲借教育改革振兴国家的情怀;或批判讽刺教育改革中的乱象,以提出改良路径的思考。这类文学创作,既是文学领域的独特收获,也记录了现代中国教育改革救亡图存的历史。

首先,教育救国文学可谓广泛意义上教育救国论的重要载体。近代以后,最早是编译者通过翻译外国教育小说的形式对民众进行教育启蒙,宣传教育救国思想。王国维主编的《教育世界》刊登了教育家裴斯泰洛齐的《醉人妻》,“全篇宗旨,首在改良社会。……而谓改良之道必由家庭以推及学校”^[33]。而译者常借机阐时政之关注,发启蒙救亡之呼声。发行量巨大的包天笑翻译的《馨儿就学记》(现译《爱的教育》),即借人物之口宣传教育救国:“我愿诸君敦品励行,咸潜心于学业,他日学成,为世所用,足以起我衰敝之祖国,藉与列强竞争。”^[34]现代文学中倪焕之、张曼青、蒋纯祖、洪翰真、尤楚等新教育者的教育实践,正是“学成”“为世所用”的具体表现。其次,现代文学所展示的教育救国探索史,为现代教育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时代启示、思想意义与史料价值。教育救国文学客观呈现了教育救国思想与实践的发展历程,以多元形式表现了教育救国实践遭遇的失败与质疑,为教育救国理想在当时历史情境下的“行不通”提供了具象阐释,有助于社会大众认知教育的真实处境与局限,发挥其切实功能。教育先锋者们的教育改革探索,也为现代教育发展提供了生动案例与历史借鉴。时至今日,《倪焕之》《虹》《赵子曰》等经典小说中蕴含的教育思想一直为教育研究者所津津乐道。其中蕴含的结合国情、注重实际、以人为本、教养合一、课程改革、城乡有别等教育思想及具体而微的教学教法探索,为中国教育改革提供了参照,对研究现代中国教育史有重要的史料意义。

(三)现代文学中教育救国叙事的价值探究

现代文学的教育救国叙事呈现了多维价值。一是在文学和教育事业建设方面。作为现代教育救国思想的文学载体,它承载了启蒙救国、改造国民性的教育重任,并以富于想象力的文学性叙事,通过生动、曲折的故事讲述和立体丰富的人物形象塑造,构建了文学理想与教育理想的高度结合。借助文学作品的形式,教育救国思想获得了活泼、新鲜、有效的宣传载体,以别样的形式普及、启示和唤醒人们对教育救国论的认知与思考。其传达的批判旧教育、建设新教育的思想对中国现代教育建构产生了深远影响,譬如先进教育理念的引入,新型教育观、语文观、文学教育观的形塑等。融入教育救国想象与叙事的现代文学,拓宽了文学“为人生”理想实践的路径,在美学价值之外生成并获得广泛的社会历史价值。教育救国叙事文学的丰富内涵与审美张力由此形成。

二是在创作主体的成长与贡献层面。一方面,文学家的教育认知与教育救国理想不同程度地影响、制约着他们的文艺观、文学创作;另一方面,教育家的文学情怀、文学创作又反过来强化、阐释其教育情怀,并推动他们对教育实践活动不断反思和探索。鲁迅曾指出:“以前的文艺,好像写别一个社会,我们只要鉴赏;现在的文艺,就在写我们自己的社会,连我们自己也写进去;在小说里可以发现社会,也可以看见我们自己;以前的文艺,如隔岸观火,没有什么切身的关系;现在的文艺,连自己也烧在里面,自己一定深深地感觉到;一到自己感觉到,一定要参加到社会去!”^[35]这段话正可以形象阐释文学创作与教育关怀的双向互动效应。叶圣陶说:“我的小说,如果还有人要看的话,我希望读者预先存这么样一种想法:这是中国社会二三十年代来一鳞一爪的

写照,是浮面的写照,同时搀杂些作者的粗浅的主观见解,把它当艺术作品看,还不如把它当数据看适当些。”^[36]救国理想使教育者与作家两种身份产生结合,深刻影响了现代文学的创作题材选择与审美价值取向,产生了现代文学史富于意味的“教育小说”创作潮流,形塑了现代文学的教育救国阐释。教育救国思想推动产生了大量教育小说,它们以丰富多样的话语样式表达教育改革观念,或赞同,或批判,或反思,构成了教育救国理想的多元主体叙事,成就了创作者的文学家与教育家双重身份建构,如叶圣陶、夏丏尊、丰子恺、朱自清等。“教育者的权力、地位、修养以及趣味,实际主宰了‘现代文学’的诠释。”^[37]这句话用来描述文学家兼教育家的创作同样合适。

四、结语

围绕教育救国这一重大主题,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命运与民族国家的教育救国想象产生了密切关联。现代文学的教育救国话语范畴涵盖了对教育制度、教育方法的探索反思和对怀有教育改革理想的人事的多重叙事,既形象阐发了文学与教育间的融合互动,也凸显了教育救国作为研究方法及其研究视角的文学史意义。作为现代教育小说的特殊一极,教育救国文学以双重视野对现代中国的教育救国演变轨迹作出审视和思考,鲜明阐释了教育与文学作为教育小说同质异构两翼的功能与价值关系,为现代文学史留下了富有趣味的风景。教育救国叙事以别样生动的言说方式,演绎了中华民族教育救国梦的曲折浮沉,深刻昭示了教育改革与兴衰对民族复兴的根本性意义,不仅对当下文学如何阐释新时代“教育强国”有着重要启示,也为如何在教育学学科体系的主体性中构建“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和“面向未来”提供了历史参照。

参考文献

- [1] 李国华.“推动历史的轮子”:叶圣陶《倪焕之》释读[J].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1):64-72.
- [2] 袁红涛,王光东.“教育”小说与知识阶层的现代转型:以《倪焕之》为中心[J].山东社会科学,2022(12):86-94.
- [3] 张江元.论中国现代小说对教育救国的想象和叙述[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74-77.
- [4] 李宗刚.新式教育与五四文学的发生[M].济南:齐鲁书社,2006.
- [5] 舒新城.近代教育史料[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8.
- [6]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M]//张品兴.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181.
- [7] 康有为.教学通义(1885年)[M]//姜义华,张荣华.康有为全集:第一集.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9.
- [8] 高践四.中国教育救国的趋向[J].教育杂志,1935(1):39-41.
- [9] 余贻泽.对教育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怀疑[N].时事新报,1932-01-18(5).
- [10] 钱基博.罪言:教育救国与教育自救[J].清华周刊,1926(2):96-97.
- [11] 编者.赘言[J].湖北教育月刊,1933(4):9.
- [12] 陶行知.教育谈话[J].千秋,1933(2):17-18.
- [13] 全国专家对于教育救国的信念[J].教育杂志,1935(1):33-57.
- [14] 吴稚晖.教育与救国[J].江苏教育,1932(5):33-40.
- [15]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M]//张品兴.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5613.
- [16] 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J].青年杂志,1915(2):10-15.
- [17] 胡适.爱国运动与求学[M]//胡适.胡适全集:第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822.
- [18] 林语堂.读书救国谬论一束[M]//巴雷.林语堂杰作选.上海:新象书店,1947:22.
- [19] 商金林.叶圣陶[M]//曾卓.中国现代教育家传:第2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115.
- [20] 师陀.春梦[M]//师陀.师陀全集:1.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352-355.
- [21] 张江元.知识分子的心灵“镜像”:中国现代小说的教育救国理想[J].名作欣赏,2009(2):128-130.
- [22] 老舍.月牙儿[M]//老舍.老舍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297.

- [23] 老舍. 猫城记[M]//老舍. 老舍文集:第7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429.
- [24] 杨义. 中国现代小说史:第3卷[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76.
- [25] 罗洪. 覃老伯[J]. 新文学,1946(2):28-32.
- [26] 冯乃超. 抗战中的作家·文学与文运[J]. 全民周刊,1938(11):168-169.
- [27] 师田手. 师田手短篇小说选[M]. 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 84.
- [28] 沙汀. 困兽记·题记[M]//沙汀. 沙汀文集:第7卷. 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7:27.
- [29] 夏丏尊. 关于《倪焕之》//夏丏尊. 夏丏尊散文集.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102.
- [30] 袁红涛,王光东.“教育”小说与知识阶层的现代转型:以《倪焕之》为中心[J]. 山东社会科学,2022(12):86-94.
- [31] 姚富耀. 剧变时代的“新村”想象:叶圣陶《倪焕之》新论[J]. 文艺理论与批评,2022(5):56-68.
- [32] 茅盾. 虹·跋[M]. 上海:开明书店,1949:278.
- [33] 编者.《醉人妻》序[J]. 教育世界,1905(97):81-82.
- [34] 包天笑. 馨儿就学记[J]. 教育杂志,1909(1):1-10.
- [35] 鲁迅.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N]. 新闻报,1928-01-30(4).
- [36] 叶圣陶. 自序[M]//叶圣陶. 叶圣陶选集. 上海:开明书店,1951:8-9.
- [37] 陈平原. 教育·经典·大众化[J]. 邯郸学院学报,2006(2):52-55.

The History and Contemporary Value of the National Salvation through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LIU Xiuzhe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Yancheng Teachers University, Yancheng, Jiangsu, 224002, China)

Abstract: National salvation through education is a particular pursuit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The function of education and enlightenment is highlighted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which gave birth to national salvation through education in the literary form, with multiple themes. As a new genre of literary creation, it presents rich and varied connotations and styles. The research on its history will provide reference for literature study and education reform.

Key words: national salvation through educatio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narration; discourse; pedigree

〔责任编辑:王建霞〕